

# 语言政治：左翼诗歌的话语转型

王雪松 樊 枢

**【摘要】**左翼诗歌在政治目标的驱使下，话语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顺向来看是语言对政治的传达，逆向来看是政治对语言的修辞，语言和政治相互成就，造就了左翼诗歌的语言政治美学。左翼诗歌对集体话语的青睐，是从个人情绪意愿转移到对民族情感意志的关注，在集体话语中又潜隐着个人话语，呈现出代言的性质；而出于现实考量，左翼诗歌采用方言这种“小众化”的方式，同时也有意采用俗语以发挥共情作用，从而实现诗歌走向大众和组织大众的目的；在现代都市这一现代化场域中，左翼诗歌对都市话语的文化姿态进行了革命隐喻化改造，在对都市底层的书写中，摒弃了启蒙话语模式而引入阶级视角。在阶级话语建构中，左翼诗歌凝聚了情感力量，激发了战斗的美学精神；但同时又因为这些话语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左翼诗歌的智性品格有所欠缺。

**【关键词】**左翼诗歌；语言；政治；话语转型

**【作者简介】**王雪松，男，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诗歌；樊枢，女，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诗歌（湖北 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22.12.76～8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项目编号：16ZDA240）的阶段性成果。

1930年代以“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为主要代表的左翼诗派，接续1920年代末“普罗诗歌”的政治热情，为现代新诗开创了独特的政治诗歌风貌，其创作体制、艺术风格深刻影响了1940年代解放区诗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抒情诗的生产。左翼诗歌的主要任务是在大众中传播无产阶级的政治观念与革命策略，进行群众动员，它也是无产阶级政党进行自我形象塑造与“权力话语争夺”的一场文学实践。<sup>①</sup>左翼诗歌的“政治性”和“大众化”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近些年，关于上述话题的研究趋势，已经从主题思想的阐释转移到形式本体和艺术修辞探究，研究维度涉及左翼诗歌的都市文化环境、左翼诗歌声音的政治性塑造等，产生了一些颇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本文亦是这种研究思路的延展，都市文化、大众化、革命性、政治性等都可从话语形式去考

察，可理解为一种宽泛的修辞行为。“政治性”和“大众化”的诉求必定要落实到语言层面，通过一系列的话语转换，左翼诗歌的语言不仅传达政治意义，而且表征政治美学，左翼诗歌在“语言”和“政治”上相互成就，共同造就左翼诗歌的语言政治修辞。

## 一、在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之间

1930年代，尖锐的阶级对立、民族矛盾使得个体的生存成为群体性问题，也为“集体”的凝聚提供了契机。在左翼诗歌里，“集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指向已经取代“五四”时期“个人”意识的高扬而成为诗歌创作的主题，左翼诗歌以“我们”为抒情主体，力图发出代表时代动向的声音，抒情话语逐渐从个人话语过渡到集体话语。左翼诗歌在用“集体”发言时，来自个体的情绪与审美又常潜隐于集体话语之中，其中优秀之作常以“个体”代言“集体”，体现了两种

话语的融合共存。

### (一)从个人情绪意愿到民族情感意志

就1930年代的社会形势而言,民族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的不断强化,逐渐将个人的生活状态演变为集体大众的生存模式,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底层民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取向构成集体话语的底色。左翼诗人主动选择用“集体”改造“自我”的身份,用趋同的民众话语改造异质化的知识分子话语,“同质化”是集体精神高扬的表现,反映了集体生存状态对文学生态的塑造。

对诗歌来说,1930年代建构的集体话语与“五四”时期的个人话语有明显差异。“五四”时期的个人话语大多指向个人意识的表达与觉醒,强调个人理想和价值意义。例如胡适的《应该》:“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但他总劝我莫再爱他。”<sup>②</sup>“我”“他”皆为明确的个人主体,诗人思考的是婚恋中剪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感情纠缠,言说的是普通个体的情感经验。再如,徐志摩的《为要寻一个明星》:“我冲入这黑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黑茫茫的荒野。”<sup>③</sup>在这里,“我”历经的全部黑暗以及奋力探寻的都只涉及个体内部的情绪,不涉及集体情感。

而在1930年代的集体话语系统中,集体话语代言了大众的情感倾向和理想价值,个人的价值只有在集体化的组织中才得以存立。为此,左翼诗人创造了一套指向鲜明的话语系统来表述个体与集体的共存,挖掘曾经被“个人”忽略的民族共同情感。例如以“我们”取代“我”,以“工农阶级的大众”来指代民众共同体,在“我们”的情感表达背后,升起的是阶级整体的情感价值主题。殷夫《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曾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鼓舞作用,在1930年代的诗坛引起了较大反响。在这首诗中,殷夫描写自我向集体融入的感受,为同时期的知识分

子提供了一种人生示范:“觉到好像有一担不重不轻的担子也终于从我肩头移开了,觉到把我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儿,使我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地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终于是消灭了!我还有什么不快乐呢?”<sup>④</sup>与旧世界告别的过程是诗人的另一次新生。黄药眠在《握手》中以“我们”作为一个阶级的代称,将自我纳入以“我们”为整体的革命群体中,控诉社会对集体的迫害与压榨:“哦,是谁使我们这样奔波?/是谁使我们这样饥饿?/是谁使我们家人父子流离?/是谁把我们的家门放火?”“谁不是上帝的儿子?/竟遭恶魔们一网打尽……”<sup>⑤</sup>国家危亡之际,左翼诗歌如果强调个人忧郁抒情则容易在情绪化的世界徘徊,只有道德化的情感方能感奋人心、协调行动。在抒发情感时,“我们”显然比“我”更能承担道德责任和凝聚力量。在“我”向“我们”聚拢的过程中,左翼诗人有鲜明的政治自觉,即有意让诗歌反映大众生存状态、将个人情绪转化为集体情感,最终实现动员大众的政治目标。

与“五四”时期的新诗相比,左翼诗歌中的集体话语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五四”时期,虽然新诗也有对民族存亡的思考,但由于个人话语占主导地位,让这种思考以“启蒙”的形式呈现,个人与群体之间呈现对立或隔离的状态。而借以唤醒群体(抑或“群氓”)中的人格独立来实现“启蒙”,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我们”中独立出“我”,最终实现民族国家的复兴。1930年代左翼诗歌强调“我”与“我们”的一体性,左翼诗人以“民族国家”为主题,以集体话语为表述方式建构集体身份,强化了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在《诗人——读〈新的露西〉以后》中,阿英指出时代迫切要求诗人彻底告别“自己的抒情”与“过往的声名”,要直面伟大的“群众的喊声”,要感受时代的“惊涛骇浪”和“狂风暴雨”,让自己的诗歌发出“钢一般的铁一般的喊声!”<sup>⑥</sup>任均的《中国哟,你还不怒吼

吗?》抓住国土沦丧、民族危亡的现实写道:“中国哟,你还不怒吼吗? /老远的且不去说它, /最近的就已经容忍不下——/满洲是去了! /热河也去了! /冀察也算去了! ……/但那贪婪的恶兽/可没有吃饱; /它还要更凶猛地; /朝着你的喉咙, /朝着你的心肺, /朝着你的肠胃……/伸出血腥的毒爪!”<sup>⑦</sup>左翼诗人任均在这首诗中所要唤醒的对象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中国”这样一个集体化的民族国家主体形象。穆木天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在《写给青年的朋友们(东北的)》中寄托了对革命战士的召唤:“朋友,低下头看这被压迫的民众, /朋友,培成革命的意志,写尽他们的悲哀。”<sup>⑧</sup>在这里,呼唤的不是个人的独立抑或思想的启蒙,而是高扬的民族情感和革命意志。

## (二)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交错融通

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左翼诗歌中的话语转换,伴随着分发传单、飞行集会等一系列带有激进色彩的革命实践,这种实践上的激进和创作上的激变原本就带有一种不纯粹性与不完整性。因此,在左翼诗人所构建的集体话语系统中,个人话语常常处于潜隐状态,与集体话语保持既遵从又疏离、既融合又冲突的关系。

左翼诗人自觉向“大众话语”靠拢,在具体实践中即以“工农的话语”贯穿在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建构之中。为了将自我改造成集体的一分子,蒋光慈、殷夫、蒲风、石灵等诗人都试图将自己的诗歌创造为“大众歌调”。但是,早期左翼诗人对“工农的话语”过分强调,导致在创作中过分依赖浅显直白的话语方式,过分夸大集体话语对社会组织的功能作用。左翼诗人在追求高效的集体化中放弃个性创造而选择效仿,却常常忽视了这种“削足适履”式的效仿与真正的“工农的话语”的区别,也忽视了未加提纯的集体话语无法涵纳现代革命观念的现实,文本在实际效果上无法实现诗人的主观愿景。正如朱自清所

评价的:“他们提倡朗读;可是这种诗即使怎么会朗读的人,怕也不能教大众听懂”<sup>⑨</sup>,左翼诗人无法真正站在大众趣味的角度上把握诗歌的大众化追求,导致部分诗歌的“大众化”并不被预设的底层大众读者领情,又遭到都市读者厌弃。

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大众化”的影响,为弥补个人话语与集体话语之间审美的罅隙,左翼诗人尝试以个人代言集体的创作实践,来促进两种话语在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一般来说,在集体话语系统中个人与集体的价值追求一致,集体意志甚至涤除个人意志,代替个人的情绪表达。1930年代,左翼诗人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这是诗人在特殊革命时期的主动选择,集体意志与个人价值观相契合,所以左翼诗人笔下的“集体”可以理解成单独个体体验的“集合体”,而用个体代言集体,在表达方式、审美理想、政治理念上达到统一。在殷夫的《血字》中,“我们”的集体价值即由“我”代言:“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sup>⑩</sup>“长子”“海燕”“尖刺”这样的个体形象代表着个体生命价值,但由于跟历史和时代这样的宏大话语对话,个体“我”悄然间被赋予了代言性质。另外,也有左翼诗人将个人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情绪融入对集体的描摹中,集体的生存状态在个人视角的参与下变得真实而生动。如艾青在《手推车》中把个人化的所见所闻拓展为对“北国人民”大集体生存状态的描述,诗中的“手推车”穿过北国的图景,即诗人以全景化的视野和个人的视角描摹的祖国苦难、贫困的现实,因为带有诗人个人话语如“寒冷”“阴暗”“孤独”的主观感受,“北国人民的悲哀”愈见深刻。田间诗集《中国牧歌》也加入了个人主观话语的调和,如“咿嘴”“咆哮”等个人化的抒写,“田野”所象征的民族国家集体显得具象可感。

左翼诗歌集体主义话语吸纳了浪漫主义话语方

式,将集体话语中的“我”注入强力和激情,锤炼成坚强有力的“我们”。在集体话语结构下,对集体生存状态进行现实主义式客观陈述是表达集体理念的主要手段之一,但左翼诗人也常常融入浪漫主义式的创作手法以加深现实题材的情感力度。浪漫主义文学以个性主义为起点,强调生命自主、个性解放和人性自由,显示于创作手法中即注重创作者自我主体性的发挥,似乎更近于个人话语。相较之下,左翼文学集体主义的精神内核强调对无产阶级集体意识形态的全部承载,以阶级化的主体架空乃至取代个人主体。但二者在对激情的强调中具有一致性,浪漫主义精神内核上对于解放、自由、反抗精神的强调,创作手法上对于创作主体情绪的张扬,都无疑契合左翼诗歌的革命激情,所以1930年代左翼诗歌能够在浪漫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实现一种微妙的融合。例如殷夫的《意识的旋律》将现实描写和浪漫抒情融为一体:“报仇! 报仇,报仇! /Dec. 11 喊破了广州! /白的黑衣掩了红光, /五千个无辜尸首沉下珠江, /滔天的大浪又沉没了神州, /海的中心等候着最大的锤头!”<sup>⑩</sup>而在殷夫另一首《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中,在浪漫主义话语的融入下,全诗展现了主人公体验生活、加入革命、融入集体的心路历程,在创作中融合了联想、直觉、无意识等浪漫化的艺术技巧。例如描写罢工游行中漫天飞舞的传单:“白的红的五彩纸片/在晨曦中翻飞象队鸽群”,而当主人公在群众运动中“融入于一个声音的洪流”后,在不停的“狂叫,狂叫”之中,一个全新的汇入集体的抒情主体在这“我已不是我, /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sup>⑪</sup>的心灵图景中升起。可见,融入集体的不仅有肉身主体,还有被现实与运动激发起来的精神主体,只有完成了心与身向集体的同时靠拢,集体才是有血有肉的集体。在这种浪漫主义式的呈现中,个体融入集体的过程非但没有落入空洞的政治宣传的窠臼,反而因为丰盈的心灵图景叙述,从而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有象征

意味但鲜活的革命者形象,这些“鲜活的有思想、有欲望、有自由意志的生命个体”<sup>⑫</sup>,增强了现实题材的表现力度。

1930年代左翼诗歌总体上从个体话语走向集体话语,呈现出强烈的革命色彩和民族国家意志,但它也适度吸纳了个体话语的浪漫个性,以“我”为“我们”代言,增加了群像“我们”中“我”的辨识度,为左翼诗歌的语言政治修辞提供了话语实践。从“个体话语”走向“集体话语”,意味着话语主体从“个体”转换为“群体”,话语方式从“精英语”转向“大众语”。

## 二、从“精英语”到“大众语”

1930年代左翼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以“文艺大众化”的探索去重构诗歌与大众之间的联系,希望能采用“俗谚俚语”,用“小调鼓儿词”的形式反映社会矛盾,从而让自己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自我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sup>⑬</sup>。“大众”的情感应该如何表达?如何使得诗歌更好地贴近人民生活,进而达到宣传动员目的?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之下,左翼诗人进一步认为诗歌必须发掘工人、农民、底层士兵这些曾经被压抑的、沉默的声音,这就要求诗歌语言系统的革新——在回避文言、书面语、外来词汇的基础上,采用民众所常用的方言土语、歌谣小调入诗,通过口头语建立诗歌与群众之间的对话互动,使诗歌得以回归民间、回归群众,通过语言形式的革新来达到组织动员的效度和力度。

### (一)从“国语”到“方言”:左翼诗歌的现实考量

“方言入诗”是文学观念向现实与生活回归的体现,“方言”的地域性、民间性特征赋予诗歌鲜明的地域文化印记。左翼诗人引“方言”入诗,不是为了激活和塑造方言,而是为了将方言作为一种组织化的话语策略,践行左翼文艺理念,这与早期新诗人胡适从“国语”建设的角度将方言作为文学审美拓展资源的思路有别。

胡适探讨了方言之于活文学和国语的意义：“凡是国语的发生，必是先有了一种方言比较的通行最远，比较的产生了最多的活文学，可以采用作国语的中坚分子”<sup>⑮</sup>，新诗人尝试以鲜活而流动的方言去冲刷、淘汰日益僵化的旧诗“雅言”体系，进而达到解放诗体的目的。而对于后起的新月派诗人来说，引“土白”入诗，则是从诗体建构意义上入眼，作为调节节奏的手段。<sup>⑯</sup>1920年代的新诗人强调方言土语的“民间性”审美资源，而在1930年代，出于现实的考量和政治的需要，左翼诗人对方言的借用是从“大众化”的角度，依靠“方言”与民众的亲缘关系，扩大诗歌的接受范围与宣传效应，以此实现民众组织化。

在1930年代，以战争和革命为底色的社会浪潮要求诗歌迅速对现实作出反映，从创作主体来看，左翼诗人迫切想让自己变为“大众中的一个”；从左翼诗歌的读者设定来说，显然是惯用方言土语、文化水平不高的底层群众。诗人选用民间大众惯常使用的“方言”，既是诗人迅速融入民众的首选话语路径，也是催动诗歌在民众中广泛传播的最佳宣传工具。例如蒲风的《鲁西北个太阳》：

奇怪！象石头击落到蜂巢，/忽来一个消息卷起了满地风波：/——“范司令唔曾战死，/范司令还在前线领导！”/那个唔鼓掌，那家唔放炮欢歌？/英勇个老将军——范筑先，/象一个家长深嵌在老百姓心窝。/可是，可是，佢等终究失望了，/恶劣个消息比疫蕃蕃还多，/范司令在世个传说，/象金砖投河，漩涡送着漩涡，/片刻间静下来了，静下来了！

——蒲风：《鲁西北个太阳》节选<sup>⑰</sup>

从选段可以看出，诗歌吸取了客家方言入诗，虽然对其他方言区的读者来说形成了阅读障碍，但对于客家方言区的读者来说，接触到熟悉的方言时，便会产生本能的亲缘性，这种定向精确的诗歌，在特定区域的传播效果更佳，更易完成对民众的政治宣传、动员

目标。这种语言的下沉并非语言现代化的停滞，至少在左翼诗人看来，方言入诗正是现代诗歌运用现代语言的体现。如蒲风认为，“现代诗歌必得是现代语言，因之也必然会是方言的”<sup>⑱</sup>。这说明左翼诗人认为采用方言并不是对现代诗歌语言现代化的反制，而恰恰是现代诗歌语言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左翼诗人选用方言材料的策略上，总体而言是站在民间立场上，力求对方言作原生态的呈现，风格上趋于“土”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甚至有些作品全用方言写就。这种全方言诗歌更近于歌谣，语言偏向土白而不仅是浅白，土白这种语言立场是民间的，逻辑自成一套，注重现实经验归纳而少有演绎。例如蕾嘉的《小荷生》：“‘小荷生！依做啥事好？’/‘阿拉去种田，肚皮要吃饱。’/‘种田要缴租格，租金缴费了！’//‘小荷生！依做啥事好？’/‘阿拉去作工，一天格辰光赚三毛。’/‘工厂关门哉，关门进弗了！’//‘小荷生！依做啥事好？’/‘阿拉去拉车，拉着快快跑。’/‘巡捕撬照来哉，三天讨弗到！’//‘小荷生！依做啥事好？’/‘阿拉当兵去，扛起高射炮，/去打东洋人，主意交关好！’”<sup>⑲</sup>这首吴方言的诗歌，使用问答对话形式，对于该方言区的读者来说极具亲和力，情感的亲近更有利于让读者认同诗歌叙事逻辑。小荷生“耕田”“作工”“拉车”等生活出路皆被堵死，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兵”，与帝国主义作斗争。说理的逻辑不是从民族大义理论入手，而是从生活现实入手，颇有“逼上梁山”之感，虽然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斗争的精神高度，但更接近民众原生态的思想。因此，采用方言的左翼诗歌更贴近现实，而非像之前的革命文学那样空泛高蹈。这种原生态的方言诗歌，有意在传播接受效果上求真求实求专，而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方言的美学改造和思想提升。

(二)从“雅言”到“俗语”：左翼诗歌的共情机制

左翼诗人在“大众语”的大道上孜孜以求，“方言

诗”是分支之一,其与民众的亲缘性促进了左翼诗歌在特定地域的传播接受,但相对弱化了其在更广区域的传播,也就是说,“方言诗”在方言区内是“大众化”的,在方言区外,又是相对“小众化”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化”来说,除了方言人诗,还有更为有效的“俗语”路径,即使用民众日常使用的“俗言”写诗,改变诗坛上由精英知识分子“雅言”统治的状态,直抵“民心声”。

一般来说,“雅言”是具有一定规范性、系统性、稳定性的语言系统,在古代多用于士人阶层的正式沟通场合或者正统文学的书面表达;而“俗语”则指的是人们在日常交谈时所运用的语言,因为具有通俗性、随意性而区别于“雅言”。本文的“雅言”概念主要指向“五四”以来精英知识分子的书面用语系统,强调其精英化与不通用性,例如科学语汇、文言语汇、外文语汇、专业语汇和欧化语法等;“俗语”的概念则指向与精英知识分子对立的普通民众常用的口头语言,包括日常谈话语汇、俗谚、俚语等语汇以及口语白话语法,强调其平民性与通俗性。

“五四”以来新诗人对“雅言”的使用无形中提高了读者门槛,例如郭沫若的《天狗》中“X底光”“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等涉及现代科学词汇;卞之琳的《足迹》中“蜜蜂的细腿已经拔起了/多少只果子”等蕴含生物学知识;李金发的《有感》中“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等用抽象玄学词汇和杂糅句法。在这些“雅言”的运用中,诗人的精英姿态凸显,一定程度上疏离了诗人与普通读者的距离。

左翼诗人接纳和采用“俗语”,消除了语言上的“不对等”和“不平等”,“藉着普遍的歌,谣,时调,诸类的形态,接受它们普及、通俗、朗读、讽诵的长处,引渡到未来的诗歌。”<sup>⑨</sup>1930年代左翼诗人对俗语的采用,是主动贴近大众生活的写作姿态,在大众话语

生态建构中达到情感共鸣。语言中包含着世界观,用俗语当然更贴近大众的生活、情感和思想。语汇“会借助自身的附带意义而重新成为心灵的客观对象,从而带来一种新的特性”<sup>⑩</sup>。左翼诗歌以民众的话语材料入诗,能够最直接地显示民众的生活状态以及情感动向。

在《门外杂谈》中,鲁迅谈道:“假如那时(指远古)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到‘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sup>⑪</sup>“杭育杭育”是与人的劳动直接关联的声音,文学的生成即模仿人们在劳动实践中原始的口语表达。1930年代,左翼诗人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杭育杭育”诗学观的实践,将民众表达情感时的语言经验融入政治性题材中,将民众不加修饰的口语表达作为社会情势的最真实再现。例如鲁戈的《打谷歌》、柳倩的《阻运》、岳浪的《路工歌》、叶流的《新十叹》等一系列诗歌以工人的“劳动呼声”为材料,用劳动语言建构诗歌与劳动生活的直接联系。如《码头工人歌》:“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搬哪!搬哪!/唉哟哟呵!唉哟哟呵!”<sup>⑫</sup>劳动号子“唉哟哟呵”能够再现劳动场景,激活苦难记忆,如果置换成雅言,不免与生活隔了一层。又如一类运用对白形式组织话语的左翼诗歌,语言通俗直白,直接与感觉相通,感同身受。辛民的《拷刑》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过了——/我没有加入!’/‘劈!’/‘哎哟!’/‘劈!’/‘哎哟!’/我没有加入!’//‘劈!’/‘劈!’/‘劈……!’/‘哎哟!’……/我加入了!’/‘贱东西!/不打就不说!’”<sup>⑬</sup>这首诗以对话体的方式描述了一位学生在警察拷打之下承认自己加入地下革命组织的过程,在“劈”——拷打的象声词和“哎哟”的呻吟声贯穿下,简单的对话把粗暴残酷的场景赤裸裸地呈现,令人胆战心惊。可以说,对声响和人声的模拟是写实表现,“这些拟声词各具

情态,极大地拓宽了现代汉语诗歌的表现范围,提升了写实程度”<sup>⑧</sup>。

左翼诗歌使用的俗语更适宜表达激情,其力度和烈度绝非“雅言”所能达到。例如浪白的《在柱头上》:“冲锋,冲锋,冲锋!/来哟,来哟,叛徒们。/我们是人,我们有生命,/我们得冲锋。//管你妈的手枪白刃,/我们的计划已定,/我们是长痛不如短痛,/来哟,来哟,我们冲开这牢笼。”<sup>⑨</sup>用民众的口语“来哟”“管你妈的”这样浅显甚至粗俗的口语来表达冲锋的激情,痛快淋漓,容不得犹豫。如果说“雅言”要用陌生化的表达来引导思维的深入,那么“俗语”就用熟悉的表达宣泄情感的喷薄,安静地思考非其所长,革命往往就是激情的,而左翼诗歌使用“俗语”就是将情绪之弓拉满。

俗语在亲近大众的同时,也会因为俗语自身的理念逻辑而限制了先进思想的表达和传播。以林木瓜的《新莲花》为例:“‘石子也有翻身日,’/何况我们还是‘人’?/千年压迫万重深,/如今要负起大众的责任。/天皇皇,地皇皇,/大家起来做个‘人’。//靠拢,靠拢!/紧紧地靠拢,朋友们!/不做地主的臣仆,/要做世界的主人。/天皇皇,地皇皇,/要做人类的忠臣。”<sup>⑩</sup>该诗以通俗化的语言向民众解说“五四”以来倡导的“人”的新观念,主旨是通过描写农民自古以来苦难的历史,呼吁其认识到自己苦难的根源是“千年压迫”的奴役制,而非上天或命运。在创作手法上,该诗运用质朴的比喻方式——“人”需要像“翻身的石子”一样反抗压迫,去打倒“地主”,做自己的主人,也需要万众联手“靠拢”,做世界的“主人”。“人”的概念在此诗中不是精英式的论述,而是将农民现实体验转化为富有鼓动性的、为民众所理解的话语形式。其中“天皇皇,地皇皇”是民间宗教仪式中的祈神咒语,也是民间大众日常惯用的俗语词汇,来自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的“祈祷”用语让诗歌在宣传效用具有动员性。但祈神咒语又在一定程度上对

“人”这一新观念起到消解的作用,或许“人”的价值要用“五四”以来的雅言才能表达,由此看来,在传播利器(“俗语”)和思想更新(“雅言”)之间寻找合适的话语,是左翼诗歌面临的挑战。

1930年代左翼诗歌在“大众语运动”倡导下运用口语俗语作诗的表达方式为诗歌带来了诗学观念以及审美趣味的又一次变革——“走入大众”的诗学追求和“贴近民间”的审美变革。口语俗言来自大众生活,是大众表达心理情感最直接、最淳朴的形式,更是沉淀着民众在数千年劳动生活中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左翼诗人在创作中大量融入口语俗言,让诗歌在表情效果(更易感动)、传播效应(更易理解)、接受范围(广大民众)上产生突破,有力矫正了雅言诗歌所导致的诗歌与民众的疏离。但左翼诗歌从精英语到大众语的转化,一定程度上也被大众语中的集体无意识浸染,先进的思想也有被俗化解释的倾向,这也导致了左翼诗歌激情多于思考的弊端。但这种与大众共情的话语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践行群众路线的表现,在特定时代又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

### 三、现代都市话语的革命转型

如果说面向民间和农村,是左翼诗歌的主动选择,那么1930年代左翼诗歌兴起的背后离不开现代都市文明的崛起。分析左翼诗人的身世经历,他们早期大多以1930年代的上海为主要生活域和创作域,而上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新旧文化的冲突、各种运动的勃发在左翼诗人的创作轨迹上留下印痕,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1930年代左翼诗人由对社会的旁观转变为积极介入。如果将乡村视为左翼诗人寻求出路、开展斗争的革命阵地,那么现代都市即是左翼诗人萌蘖革命思想、觉醒现代意识的最初战场。更为重要的是,都市是现代文明最直观的呈现,都市的空间性跟现代的时间性紧密捆绑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代性的时间和文化体验可

以落实到都市书写上。

### (一)都市话语的革命隐喻化

纵观中国新诗发展史,无论是草创期写实论理的白话诗人,还是高扬主观情感的创造社诗人,抑或是注重灵感体验的现代派诗人等,对都市与现代的体验基本都是同源的。但与其他诗人不同的是,左翼诗人眼中的“都市”是站在革命立场上所看到的充满资本主义压榨、民众苦难、工人暴动的都市,不仅是现代的都市,更是革命的都市。

现代城市的崛起意味着近代资产阶级文明带来的社会运作方式和思想文明上的革新,在社会结构上与传统的乡村形成二元对立的空間,因而现代都市文明不仅为新诗创作带来新的审美资源,更塑造了诗人现代化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郭沫若曾用“黑色的牡丹”形容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徐志摩的《南行杂纪》中对都市毁坏传统美景发出无可奈何的感慨:“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里,我每回去总添一度伤心:雷峰也羞跑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哈得在湖心里造房子,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工厂的烟替代了出岫的霞,大世界以及什么舞台的锣鼓充当了湖上的啼莺,西湖,西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sup>②</sup>“雨巷”“大都会”“咖啡馆”等纷纷进入现代新诗中……现代都市文明作为个人体验与情绪的触发点和书写对象,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姿态。但是,左翼诗人笔下的都市是工人阶级生存与战斗的背景,是不同集团争夺下的都市,对立和反抗无时无刻不在上演,体现的是一种革命姿态。

上海是许多左翼诗人开始创作的地方,例如蒲风、艾青都曾在上海生活,深刻体验了上海的商业化与现代化,因此左翼诗人笔下的都市常常寓指社会背景复杂的上海。一方面,现代都市里的工业文明带给人力量的感受,这与革命中对强力的召唤不谋而合,故而现代都市话语被赋予革命隐喻式的表

达。蒲风曾倡导“现代的诗,应当更多一些工厂的汽笛,人类集团的争面包争太阳的喊叫,映照”<sup>③</sup>,宣称“唯有这骚扰的广大的都会才是我们斗争地”<sup>④</sup>。左翼诗歌塑造的现代工业文明画面是一个民族反省、革新的革命寓言:“我们要创造一个红色的狞笑,/在这都市的纷嚣之上,/牙齿与牙齿之间架着铜桥,/大的眼中射出红色光芒。/他的口吞没着整个都市,/煤的烟雾熏染着肺腑,/每座摘星楼台是他的牙齿,/你唱的是机械和汽笛的狂歌!”<sup>⑤</sup>(《一个红的笑》)都市是诗人借力突破自我、革新社会的魄力:“我现在是列在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队伍中,以我的瘦臂挽着钢筋般的铁肉呢。”<sup>⑥</sup>(《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都市是为一往无前的革命赋形的力量源泉:“汽笛火箭般的喷射,/喷射进心的深窝了!/呵哟,机械万岁!/展在面前是无限的前途,/负在脊上是人类的全图!/呵哟!引擎万岁!//燃上灼光的前灯吧!/让新的光射透地球,/以太掀着洪涛,/电子的波浪咆哮,/呵哟!光明万岁!”<sup>⑦</sup>(《前灯》)当现代工业力量与革命理想相遇,左翼诗人的革命激情便找到具体的投射点,对都市话语的革命化隐喻书写,特别是对“力”的召唤,为左翼诗歌的政治抒情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都市里盘根错节的阶级矛盾、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让都市在左翼诗人笔下也往往以象征罪恶的符码出现。蒲风曾在《所谓“现代生活”的“现代”诗:评〈现代〉四卷一期至三期的诗》中批判现代派诗人对现代生活认识的虚假:“个人的寂寞怨哀充满了篇幅,有的不见都市的影子,有的也看不到日益破产的农村。最容易发现的不是都市里的火车,工厂,一切资本主义的文明,而是‘萤灯’‘残红’‘过时的木槿花’‘虫声’‘毒蛇’‘归鸦’‘北征的燕子’‘蟋蟀’‘鸣雁’‘雏菊’‘腊梅’‘玫瑰’‘海棠’‘芍药’‘百合桥’‘黄昏’‘棕榈园’‘教堂的钟’‘怨妇’‘砧杵’‘棺材’‘白云深处’‘穷谷’‘小鹿’‘紫阳花’‘落叶’

‘梧桐’‘金鱼缸’‘佛珠子’‘鹰’‘鹤鸟’……被过时的封建诗人奸淫了千次万次的东西。”<sup>⑧</sup>在左翼诗人看来,因为带着“个人的寂寞哀怨”看待现代生活,所以现代派诗人将现代生活的种种均作为个人情绪的掠影,他们的诗歌也就因此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因而与封建的旧诗没有区别。左翼诗人从都市表象中看到被各种势力挤压的普通民众的苦难生存状态,并由此出发反省现代都市残酷的一面。在左翼诗人笔下,现代都市是由码头工人(如石灵的《码头工人歌》)、打夜工(如曼晴的《打夜工》)、报童(如武蒂的《报童》)、洋车夫(如刘非的《洋车夫》)、乞丐(如中坚的《老乞丐》)和妓女(如宋寒衣的《夜底流浪者》)等广大无产者构建起来的都市,在诗歌中诗人还原他们的生存环境,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将苦难和都市的繁华共同托出,城市“必然展开了寒冷、饥饿以及一切恐怖的场面”<sup>⑨</sup>。殷夫从阶级对立的角度表现都市的贫富不均:“都市有电灯,/不装给穷人”<sup>⑩</sup>;关露的《马达响了》将现代机器的运转与工人血汗的润滑联系起来:“血汗变成了绸子,/绸子变成资本家的资本”<sup>⑪</sup>;王亚平的《南北楼》描绘在充斥着黑暗、热流、各种化学气体的艰苦环境中工作却无法获得更好生活的工人:“走进了南楼,/黑洞洞看不清双手。/哗隆! 哗隆! /哗隆! 哗隆! /机轮怪叫着,/几只小电烛在热气里发抖,/两个油垢黑脸的弟兄,/不敢眨眼地注视飞动轮轴。/小铁窗/射进几线阳光,/灰暗中三个钢塔——像似吞人魔鬼,/蒸发着碳酸化钠,/臭气铁腥油腻味,/毒蚀了心肺,/炙焦了面皮,/一年三百六十日,/得不到痛快的呼吸。”<sup>⑫</sup>以革命者目光审视都市场域,都市与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左翼诗歌因此将都市视为革命的对象。

一方面是都市文明带来的革命浪漫激情,另一方面是革命思想审视下的都市罪恶,左翼诗歌在充满张力的现代都市文明中展开书写,现代文明的产

物被寄予革命隐喻,战斗(抑或暴力)的美学精神逐渐显露。

## (二)都市底层书写的阶级转向

1920年代知识分子在启蒙的主题之下观照现实、揭示愁苦,试图从思想层面唤起广大民众“人的意识”的觉醒,从群体中分离出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人”;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以阶级对立的观念划分敌我阵营,唤醒人的阶级意识,将“人”归并成为具有阶级属性的“人们”。左翼诗人在书写都市底层生活和底层民众时,明显从启蒙话语过渡到阶级话语。

例如在涉及普通民众苦难生活的题材时,“五四”时期诗歌表现的是人的困境,呼唤的是人道主义精神,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胡适在《人力车夫》中用对话体的形式叙述了少年人力车夫的悲哀与苦闷:

客问车夫,“你今年几岁? 拉车拉了多少时?”/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凄惨。”/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我又寒又饥。/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您老又是谁?”

——胡适:《人力车夫》节选<sup>⑬</sup>

在“五四”知识分子普遍的问题意识下,胡适以人道主义目光看待现实问题,同情他们的贫穷与困苦。虽然人力车夫的苦难根源在该诗中也隐约指向动荡不安的社会,但诗人并未对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作深层次探讨,人力车夫呈现给读者的姿态也仅限于不幸而并不具有反抗精神,“我”与“你”之间尽管存在矛盾,但不是对立反抗的两端,而且“你”和“我”的身份之间没有转换的意图,自然不具备革命的动力。同样是表现下层民众的苦难,殷夫的《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摆脱了常见的主客问答式话语,值得注意的是该诗出现了“我”“他”“他们”“她们”

“你”“我们”等多种人称代词,跟“五四”时期角色身份按社会分工固化的情况不同,左翼诗歌里的角色身份被归类和转换,这也是“革命”应有之义。“他们”与“她们”是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本来“我”处于观察者的角度,审视他们的痛苦,但“我”还是一个行动者,当“我”突入人群,散发传单,高呼“我们”,则汇聚成一个声音,“我”与“他们”“她们”融合成“我们”。“我”“他们”“她们”是因为属于同一阵营而融合,而处于敌对方的“他”,竟然也有争取融合的可能。如诗中对于巡捕的描写:

一个巡捕拿住我的衣领,/但我还狂叫,狂叫,狂叫,/我已不是我,/我的心合着大群燃烧。//他是有良心的狗:/“这是危险的事业——/只要掉得好舌头,/也可摆脱罪孽……”//谢你哟,我们的好巡警,/我领受你的好心,/从你我已看出同情的萌芽,/却看不见你阶级的觉悟。//这是对垒的时候,/只要坚决地打下心肠——/不替杀人者杀人,/那就是我们的战将。

——殷夫:《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节选<sup>④</sup>

对“巡捕”这样的角色,在“五四”时期并未贴着阶级标签,只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看待身份。如周作人《背枪的人》:“早起出门,走过西珠市。/行人稀少,店铺多还关闭,/只有一个背枪的人,/站在大马路里。/我本愿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怕见恶狠狠的兵器。/但他长站在守望面前,/指点道路,维持秩序,/只做大家公共的事,——/那背枪的人,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sup>⑤</sup>这种视“巡捕”为“朋友”“兄弟”的观点,在1930年代严峻的社会现实里显得有些幼稚。在殷夫这里,从阶级属性出发,将“他”(“巡捕”)置于阶级分析的解剖刀下,无疑显得更为深刻,为“我们”的最大化、最强化提供了可能路径,这比人道主义的说辞更具说服力。

而且当“我们”团结起来,拥有了无产阶级的觉悟后,“我们”需要的不是可怜和同情,而是主动去战

斗和革命的能动性。所以“我们”在诗句中的高频出现,就是以一种压迫性的存在突出革命主动性。现代都市工业文明中的“我们”,也从工业文明中汲取力量和品质。例如:

我们的意志如烟囱般高挺,/我们的团结如皮带般坚韧,/我们转动着地球,/我们抚育着人类的命运!/我们是流着汗血的,/却唱着高歌的一群。/目前,我们陷在地狱一般黑的坑里,/在我们头上耸着社会的岩层。/没有快乐,幸福……/但我们却知道我们将要得胜。/我们一步一步的共同劳动着,/向着我们胜利的早晨走近。//我们是谁?/我们是十二万五千的工人农民!

——殷夫:《我们》<sup>⑥</sup>

在左翼诗人眼中,工业文明的表征“烟囱”“皮带”,物质属性为“高挺”和“坚韧”,其与无产阶级品质“意志”和“团结”相对应。在某种程度上启蒙话语是认识人与人的差异性,而阶级话语更注重发掘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左翼诗歌在对都市意象进行阶级赋性后,充分调动大众的感性认知,从而为身份认同奠定认识 and 情感基础,使共情成为可能,使共振成为趋势,现代都市话语由是逐步完成革命改造。

综上,左翼诗歌在政治目标的驱使下,话语形态发生巨大变化,顺向来看是语言对政治的传达,逆向来看是政治对语言的修辞,语言和政治相互成就,造就了左翼诗歌的语言政治美学。左翼诗歌对集体话语的青睐,是从个人情绪意愿转移到对民族情感意志的关注,在集体话语中又潜隐着个人话语,呈现出代言的性质;而出于现实考量,左翼诗歌采用方言这种“小众化”的方式,同时也有意采用俗语共情,从而实现诗歌走向大众和组织大众的目的;在现代都市这一现代化场域中,左翼诗歌对都市话语的文化姿态进行了革命隐喻化改造,在对都市底层的书写中,摒弃了启蒙话语模式而引入阶级视角。在阶级话语建构中,左翼诗歌凝聚了情感力量,激发了战斗美学

精神;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话本身的局限性使得左翼诗歌智性品格有所欠缺,这也是左翼诗歌留给政治抒情诗的教训。

#### 注释:

①参见肖百容、张宁:《抗日根据地旧体诗词创作与中国形象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

②胡适:《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96页。

③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4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④Ivan(殷夫):《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拓荒者》第4、5期合刊,1930年。

⑤黄药眠:《握手》,《流沙》第2期,1928年4月1日。

⑥阿英:《阿英全集》第3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页。

⑦任均:《中国哟,你还不怒吼吗?》,《生活知识(上海1935)》第2卷第2期,1936年5月16日。

⑧穆木天:《写给青年的朋友们(东北的)》,《读书月刊》第2卷第6期,1931年9月1日。

⑨朱自清:《朱自清散文全集》下卷,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804页。

⑩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⑪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68页。

⑫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2页。

⑬申燕:《1949-1966年“社会主义戏剧”研究》,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11页。

⑭穆木天:《发刊诗》,《新诗歌》第1卷第1期,1933年2月11日。

⑮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5页。

⑯参见王雪松:《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02页。

⑰黄安榕、陈松溪编:《蒲风选集》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⑱蒲风:《抗战诗歌讲话》,诗歌出版社1938年版,第43页。

⑲蕾嘉:《小荷生》,《新诗歌》第2卷第1期,1934年6月1日。

⑳编辑委员会:《我们底话》,《新诗歌》第2卷第1期,1934

年6月1日。

㉑[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页。

㉒鲁迅:《且介亭杂文》,上海文艺出版社1937年版,第95页。

㉓石灵:《码头工人歌》,《新诗歌》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日。

㉔辛民:《拷刑》,《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日。

㉕王雪松:《现代汉语虚词与中国现代诗歌节奏》,《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

㉖浪白:《在柱头上》,《拓荒者》第4、5期合刊,1930年。

㉗林木瓜:《新莲花》,《新诗歌》第1卷第1期,1933年2月11日。

㉘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3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㉙黄安榕、陈松溪编:《蒲风选集》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12页。

㉚蒲风:《从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诗歌季刊》第1卷第2期,1935年3月25日。

㉛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8页。

㉜Ivan(殷夫):《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拓荒者》第4、5期合刊,1930年。

㉝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㉞蒲风:《所谓“现代生活”的“现代”诗:评〈现代〉四卷一期至三期的诗》,《出版消息》第29期,1934年2月1日。

㉟黄安榕、陈松溪编:《蒲风选集》下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04页。

㊱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㊲胡楣(关露):《马达响了》,《新诗歌》第2卷第2期,1934年7月6日。

㊳王亚平、王涓:《两代书续》,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㊴胡适:《胡适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㊵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2-83页。

㊶北社编:《新诗年选》,亚东图书馆1929年版,第35-36页。

㊷殷夫:《殷夫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9页。